

隱藏的大家

司馬遷

之人格與風格

李長之 著



李長之，一位隱藏的大師，20世紀中國
最伟大的文學批評家，與吳組湘、林庚、
季羨林并稱為『濟華四劍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隐家
的
太

李长之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 李长之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4

(隐藏的大家)

ISBN 978 - 7 - 201 - 05311 - 0

I. 司… II. 李… III. ①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 ~) - 人物研究②史记 - 研究 IV. K825.81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52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18 千字 印数: 1 - 5,000

定价: 26.80 元

关于“隐藏的大家”

学问乃天下公器，这是一条绵延而义无反顾的河流。在这学问的河流之上，一些有作为的学者，孜孜以求，记述下他们常年累积的学术思想，有的虽未终其研究，但已发出绚烂之光芒，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长久以来，由于社会环境或自身性格的原因，这些有作为的学者被隐藏起来。有的学禅，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的隐忍，甘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有的太过纯洁，不被世俗所容；有的遭遇不宽容的时代，被压倒在地，仅仅因为说了“犯忌”的话，而遭罪一辈子，因而学术的话语也被掩抑……

幸运的是，一些有心人，默默地记录他们的思想，保存他们的著作，珍藏他们的讲义，才让这文化的血脉不断，学问的河流不枯。

今日，我们学海拾珍，阅读这批大家作品的时候，发现它们竟是如此熠熠生辉，如此沉甸甸。故以“隐藏的大家”作为文丛之名，以求埋下读书之种子，续上学术之薪火。

编者

女藏

李长之，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

批评家，与季羨林、林庚、吴组缃并称为

“清华四剑客”。

的大家

序

于天池 李 书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李长之先生 1946 年完成的作品，1948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在李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生活环境上更为恶劣的了：他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李白及其痛苦》创作于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之际，虽然生活清贫，但衣食无忧；他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创作于建国后的 50 年代，生活更是安定了很多；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不同了，它的创作始于 1941 年，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

长之先生生于 1910 年，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在父亲病逝后，长之身为长子，负担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在四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遑宁处。在中央大学和编译馆工作期间，每当日机轰炸的时候，他要拉着甚或背着母亲躲进防空洞。他的生活极其艰难，弟弟知道他喜欢吃老玉米，特意买来老玉米，为了省钱，他竟硬逼着弟弟退回去。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他得了肺结核。婚后，由于夫妻双方的性格都很刚烈，尚处于磨合期，龃龉时有发生，以至于李长之说那段时间是他“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

但是，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也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的文化和思想条件上更为优越的了。尽管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作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李白及其痛苦》才华横溢，学识相当深厚，但毕竟生活阅历有限，挥洒之时显得才气大于学识。而且，那时他的德文和德国文艺美学理论的学习刚刚踏入门槛，像他的《鲁迅批判》对于鲁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道教徒的诗李白及其痛苦》对于李白人格精神的分析也依稀感觉到尼采“超人”理论的痕迹。建国之后写《李白》、《陶渊明传论》，生活倒是安定了，但是在批评的思想方法上似乎受到了较大的挤压，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却了原来所服膺的美学利器，尝试拿起当时风靡的文艺理论工具。尽管长之先生肯于努

力并有天分,在当时的批评家里,他对工具的运用颇为出色,但有的地方显得生硬勉强,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更是使他在写作这些传记人物时力不从心。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则不然,在学术道路上,作为中央大学的讲师、副教授,长之先生通过讲授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更系统的把握。尤其此时,他与宗白华先生朝夕切磋,更是对于文艺美学理论、对于中国美学史的认识和研究有了系统的提高。在中国文化方面,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孔孟之道,写有《从孔子到孟柯》、《儒家的根本精神》、《孔子与屈原》、《韩愈》等论文,他研究古代的美学理论,发表了《古代的审美教育》、《秦汉之际之儒家美学之继续发展与结束》、《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等论文。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这时他译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了《德国兴亡鉴》、《西洋哲学史》、《德国的古典精神》等系列专著。此时长之先生的学养、阅历与十年之前他在清华大学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成熟、深厚、广博、自由,也不再对德国古典美学盲目崇拜,而是有了理性认识。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加以排斥,而是有了理性的吸收。批判的武器在他手中此时可谓得心应手,挥洒自由,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奏刀豁然。如果说,我们在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依然感到长之先生作品中那种热情、浪漫、鲜活,那种特有的年轻气的话,那么其中在文笔的奔腾澎湃之中显然又增加了纯净而沉着的成分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正是长之先生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全面地思考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时,他由国防文化,想到了文化的国防,由战前的五四运动想到了战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断言“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路”。他曾经向许多青年热切地说过这一愿望,认为自己所指出的这文艺复兴的征兆终于不虚。他曾在《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一文中满怀深情地放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胜利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这使他在研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时候具有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更具有有一种难得的文化激情。在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同时,长之先生还写有一部论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部书充满热情地探讨中国在抗战中,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文化走向,预言“胜利既然在望,我

们好的传统之更加发挥也一定在望”。“我们现在业已走上民族的解放之途了，随着应该是文化的解放。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2页）表面上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两部不相干的书，一个是就当前的文化发展谈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就历史上的巨著进行研究，但实际上两书是互为表里的姊妹篇。前者阐述的是长之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态度方法，是宏观的鸟瞰；后者是就中国文化的一部著作进行研究，是具体而微的解析。《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形而上的阐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理论上的具体实践。

一部成功的专著的出现，除去作者的才气素质外，同作家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乃至时代精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不能或缺的。但如果生活环境是从生存的意义说的，那么它并不是很重要，一般来说，只要能生存就能创作。有时恶劣的生活环境反而能达到“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的效果。相对来说，思想文化环境反而比较重要些，它可以营造学者的创作氛围，限制或者发展学者的思维想象空间，推动或者阻滞学者的逻辑思维，它对于学者能否创作出质量高或者质量低的学术著作关系甚大。但是，时代精神和激情对于学者的作品在更高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它决定的是能否产生更高层次的伟大的作品，而这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对于长之先生而言，大概抗日战争所激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激情对于他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至关重要，他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文艺复兴的渴望和期盼，从某种意义上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产生了难得的共鸣共振，这对于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创作是莫大的助力，也是我们今天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最有兴味的地方。

自序

在最近接到叶圣陶先生的复信,知道开明书店有着肯收印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写成的日子)初写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写的序文都割弃了。现在愿意报告给读者的是:本书蓄意要写,悬二十七年(编者注: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下同)的秋天的事;在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在路上才对《史记》有着整个的接触,直到在成都住定下来,才把意见整理了一下,又对全书作了一个自己行文时需要的索引,可是没有动笔。不久又到重庆去了,经过了三年,首先写出的只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这时担任着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所以先把这方面的意见写成了,现在收入本书的第九章第三节。后来又因为在中央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常想把《史记》之史诗性的优良写出,但老没有实现,只是同时却重新有着要把全书写出的冲动了。又过了三年,这冲动到了三十三年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气写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这一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迟,日子是八月十六日,还有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也在这期间写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费了半年的工夫,书写成了小半(司马迁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着;第一章因为是对司马迁的时代之整个把握,我不敢轻易写,也曾写出了一部分,关于司马迁之思想和艺术方面,则怀着畏难更大。接着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来了,我很少写东西,教书生活也放弃了,我离开了住久了的沙坪坝,迁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可是与我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日本投降虽给我了一时的兴奋,也苦为时极暂。——三十四年是这样空白地过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飞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转,头两个月在忙我的翻译康德《判

断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决计推开一切，全力写《司马迁》，首先把第一章补写起来了，十分高兴，果然写得很顺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艺术的方面也完成了，结论也写出了，两月的工夫得了十二万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记录，而全书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么喜爱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风光，却也恋恋！

有人问我写作时的参考书怎么样？我很惭愧，实在不博，学校里只有一部《史记会注考证》，可是被一位去职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写完《司马迁》以后的四个月到了北平，多少买了点书，关于《史记》的也有十几种，《史记会注考证》即在其中。但仔细看上去，这些书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动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说：阿Q不是会唱“手拿钢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么？我也有“无师自通”的地方呵！况且，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近人动辄以参考书多少为计较，我便不太重视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书中多已随文注明。现在我只想特别提出，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叶圣陶两先生在所编的《略读指导举隅》中才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在论及《屈原贾生列传》或《魏其武安侯列传》时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张裕钊（我所说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准书》而得），他们对于《史记》的贡献，我想以后作《史记研究书目提要》时再为表彰吧。同时，我却也可以坦白地承认，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但他们的功劳究竟是值得感谢的。

又有人见我分别发表了本书的几章时，曾问我：是不是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的课？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现在的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版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我们这样讲法，却是“无本之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学里讲？第二是，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作为我写作的对象。——我管什么大学里有没有这门课？

在我写作时的确经过了些艰辛，可是写完了，校完了，也觉得仍是十分空虚，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写时，最

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像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是非还是诉诸读者吧！

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本也想把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这样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号到北平，现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这稿子，在感到这稿子本身空虚之外，才觉得来了北平还没做什么事之愧耻，是更有些怅怅然了。

想到最初写此稿时，我的朋友蔚初所给的鼓励之大，这鼓励令我永不能忘却，现在远隔万里，就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祝她康乐，祝她勤奋地写作吧。叶圣陶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好意，也一并谢谢！

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静，皓月当空，
长之记于北平广济寺

目次

序.....	1
自序.....	4
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1
一 伟大的时代.....	1
二 楚文化的胜利.....	2
三 齐学.....	4
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	9
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10
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13
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15
第二章 司马迁的父亲	19
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19
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20
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22
四 司马谈与封禅	25
五 伟大的遗命	26
六 天才的培养	28
第三章 司马迁和孔子	30
一 教育之效	30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30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34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37
五 司马迁与春秋	43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48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	52

第四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上)	
——无限之象征	54
一 从耕牧到京师受学	54
二 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55
三 仕宦生活的开始——空峒扈驾和奉使蜀滇	59
四 封禅与北地之游——“无限”之象征	61
五 负薪塞河	63
六 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	64
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66
第五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	
——必然的悲剧	70
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70
二 好奇与爱才	72
三 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	75
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83
五 李陵案的原委	87
六 两个英雄的晚年	95
第六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	
——《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	100
一 缺和补	100
二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	103
三 《史记》中不易辨别为谈著抑迁著者	107
四 司马迁著述之根据与其创作时之情形	108
五 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	110
六 结论和余论——兼论褚先生	130

第七章 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

——浪漫的自然主义····· 135

- 一 司马迁之识····· 135
- 二 司马迁之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38
- 三 语言学的训练——所谓古文····· 139
- 四 司马迁之读书····· 140
- 五 司马迁与儒家····· 142
- 六 司马迁之根本思想——道家····· 142
- 七 司马迁和荀学····· 149
- 八 浪漫的自然主义····· 151
- 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151
- 十 司马迁之政治观····· 158
- 十一 司马迁之民间精神····· 162
- 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167
- 十三 史官的传统····· 169

第八章 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 173

- 一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173
- 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178
- 三 建筑结构韵津····· 196
- 四 句调之分析····· 207
- 五 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 219
- 六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224

第九章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230

- 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230
- 二 《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232
- 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234
- 四 司马迁之讽刺····· 245
- 五 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最后归宿····· 250

代跋：“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 252

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 伟大的时代

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的。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 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 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二 楚文化的胜利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〇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年代更几乎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作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诂》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唯项羽会作那楚辞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辞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簠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坚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糅”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